



熊宗仁◎著

何应钦^的 晚年岁月

他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望尘莫及的

HEYINGQIN DE
WANNIAN
SUIYUE



团结出版社

何应欽^的 晚年岁月

熊宗仁◎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何应钦的晚年岁月 / 熊宗仁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26-0902-0

I. ①何… II. ①熊… III. ①何应钦 (1890~1987) — 评传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1213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31 千字

印 数: 6000

版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0902-0/K · 74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导 言

何应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军事首脑。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总教官。他因追随蒋介石反共而飞黄腾达，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等职。在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过程中，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内战及蒋介石中央系兼并异己的混战中，他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望尘莫及的。何应钦从夜郎故地的深山中脱颖而出；在民国初年南北军阀割据混战的夹缝中平步青云；在派系林立、矛盾倾轧几无宁日的国民党官场中，能游离于漩涡之外，或虽偶有卷入却能化险为夷；他辅佐心性专断、急躁、多疑的蒋介石，虽曾抗争也备受猜忌、冷落，但终能荣损与共；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他在恐日、妥协、谋和与抗日的矛盾困惑中挣扎转换；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幻想挽狂澜于既倒，替蒋介石组阁，负隅顽抗；去台湾以后，虽然失势但却未失宠，连续在蒋介石、蒋经国两个时代享誉不绝且有所作为；他在军事上的“才干”、官场中的“武甘草”功能、“何婆婆”性格以及生活中的清心寡欲、人格魅力、长寿秘诀……其间的因果是非，不唯研究者关注，一般人也津津乐道。

去台湾以后，他是台日条约的重要牵线人。他曾积极拼凑“东北亚反共联盟”，妄图依靠日本右翼势力，实现“反共抗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他却又对日本朝野有助于改善日中关系的一切努力，对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大肆抨击，俨然又成了台湾岛上“反日”的带头人。其前后表现虽异，但实质一样。何应钦对日观的主旨，既有感情、立场、功利方面的因素，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斗争需要。这

将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明晰。

去台以后，何应钦在“反共复国”的主旨下，对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出过一些积极的建议，进行过一些努力。特别是他始终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的阴谋。虽然他顽固地坚持极不现实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强调中国应该统一，却是与蒋经国时代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前提相吻合的，也是为所有炎黄子孙所欢迎的。

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中，何应钦长期把反共作为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为之宣传鼓动、践履笃行。何应钦始终标榜自己是“爱国”者，但他与真正爱国并且能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共戴天。实践已经证明，一切真正的爱国者，他真诚的爱国动机，必须同他所选择的爱国、救国道路是统一的。诚然，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上一切有爱国心的人所选择的爱国方式和救国之路，都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但是，何应钦所标榜的“爱国”，同他顽固坚持的反共立场，历史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一条民族自弱自戕的绝路，而他却至死未悔。何应钦所为之拼命的这条道路，延缓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使历史倒退；在抗日战争中，它削弱了抗日的力量，使国共两党和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付出了不应付出的沉重代价。

国共之间的战争早已结束，一切爱国者都希望结束两党的对峙，使祖国尽快统一、富强。但何应钦生前固于一党之私及个人之利，不肯放弃早被实践证明既违背时代，也违背人心的反共的政治信仰。把“爱国”等同于反共，这是他个人及同类人物的历史悲剧，也是国民党制造的我们民族在 20 世纪的一大悲剧。

制造历史悲剧的人物，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结束历史悲剧的人物，终将成为历史上的英雄。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以三代元戎、两朝老将的姿态，把对蒋介石的忠诚移之蒋经国身上，“忠臣”“良将”兼而有之。除了感情的延续外，仍是为“正统”信仰和个人操守所驱动。

何应钦对社会、官场的普遍适应性与他个人生活作风、个性品格之间

的矛盾，如果机械地套用模型分析方法，似乎这矛盾的提出本身就因矛盾对立而不能成立。

这对矛盾的表象，是受周围的人推崇备至的宽厚的处事待入之道和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他的严于克己的生活作风和某些深含儒家中和之道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个性，既是蒋何关系的润滑剂，又是在权力角逐中不易成为众矢之的的护身符。何应钦外在的优柔寡断、诚挚和内心的深含不露、工于心计能相辅相成。他在官场上和政治斗争中的世故圆滑、礼让谦退，与他不大肆聚敛挥霍、洁身自守颇不协调。他没有恶习嗜好，但对周围的腐败蔓延、贿赂公行、狂嫖滥赌、巧取豪夺等现象虽有不满，却无可奈何，有时还故意放纵，以免结怨。这种社会环境与他个人崇奉的道德原则的冲突十分激烈，他要真正坚持个人认可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了自保并求得发展，他不能不表现出政治道德与生活道德的矛盾、对人对己矛盾的双重人格。他追随蒋介石反共起家，一切皆以反共利害为依归。在蒋介石面前，他一味顺从逢迎，很少立异执言；即使追权逐势，只想巧取不敢豪夺，故能侥幸避祸，保全禄位；而他对上谦恭，对左右和气，对朋友颇礼貌，对部下、学生均无架子，人缘颇好，亦能使部下替他卖力。他办事缜密，工作勤奋，循章依矩，不越雷池。有时亦身先士卒，能作表率。他追随蒋介石，“从一而终”。在CC系、复兴社、政学系之间，取超然之势，尽量回避冲撞。去台后，他对“大陆派”与“土著派”，亦双双结缘联谊。即使受到排挤，也能委曲求全，终能旋伏旋起，解怨释嫌，永享尊荣。

何应钦已经逝世十多年。台湾今日之国民党也非何应钦在世时之国民党。自祖国改革开放和台湾调整大陆政策以来，两岸史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不少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或取长补短，或初有共识，或求同存异。但由于何应钦研究中造成的盲区、误区甚至雷区的历史原因的延续，以及海峡两岸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文化旨趣的差异，即使在信息时代，史料资源已可共享的今天，对何应钦其人其事的研究和评价各执一端者非仅一二。

复杂的政治、历史、人文背景，造就了复杂的历史人物。何应钦作为

近代中国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军事人物，其所作所为自有他无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或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实践尚在进行之时，自然不能盖棺定论。而当何应钦作为历史人物进入研究者视野时，肯定其历史合理性或指陈它们的历史必然性，便有了可能与必要。因此，笔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把何应钦研究作为从事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切入点，也曾发表过引起争议的“一家之言”。笔者认为，在何应钦研究中影响面最大的问题，大约是“攘外安内”、“何梅协定”、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主战动机、亲日派等最为关键。现提出探讨，以期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一、“福将”之星的陨落	1
金陵春梦破 梦破人未醒	1
羊城旧侣拆墙 败将尽忠赴台	4
老臣蛰居避祸 顺民投石问路	17
“改造”中失势 “顾委”里获宠	25
借童子军还魂 当老司令发威	33
二、“道德重整”中的领袖梦	41
隔岸结反共姻缘 居后获再起希望	41
请上帝反共 抬孔子助威	48
上将周游列国 《龙》剧流毒欧美	53
“MRA”门庭冷落 “文化复兴”旧调新弹	65
三、“国民外交”的马前卒	72
受降主官访日 头号战犯洒泪	72
老马识途堪驰驱 牵线搭桥膺重任	81
“反攻大陆”惨败 “国民外交”雪崩	90
往昔妥协巨头 今朝反日先锋	98
四、修补反共思想体系的老兵	107
忙时常忆当年勇 闲来更感君恩深	107
怀旧主亦步亦趋 拥新君不越雷池	113
祝大寿欣慰元老 颁特勋安抚众心	130

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吹鼓手	142
高唱“三民主义” 难舍“反攻复国”	142
何元老当主席 大同盟枉费力	146
身先士卒亘古未有 冷战心战效果全无	154
六、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参	163
推动岛内经济建设 寻求海外关系发展	163
移情山水寄雅兴 倡导旅游运匠心	172
针砭时弊说革新 挽救世风倡文明	181
七、乡情煎熬中的魂归人	191
贤内助患绝症 好丈夫侃长寿	191
寂寞黄昏路 万种思乡情	199
风云百年忌讳多 丹青一幅遗恨长	206
后 记	218

一、“福将”之星的陨落

金陵春梦破 梦破人未醒

(一)

1949年4月1日10时半，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离开南京飞往北平。3个小时后，南京当局指使反动军警特务对给这个代表团送行的要求真正和平的6000爱国学生行凶。据国民党中央社消息，迄2日黄昏止，学生已死1人、伤11人、轻伤88人。而另据法新社2日报道，学生死2人，12名濒于死亡，55名重伤，50余人失踪，并有数名学生被捆起来投入河中。

南京惨案这血写的事实，把何应钦等人骗人的和谈“诚意”冲刷得一干二净。4月3日，新华社在《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的社论中指出，南京惨案更进一步说明了李宗仁、何应钦政府的和平“诚意”是什么。自这届政府上台以来，“做了一件确实有利于和平谈判的事情没有呢？没有，一件也没有”。李宗仁、何应钦等人，“一个战争罪犯的毫毛也没有损伤过，但是逮捕和屠杀争取真正和平的人民的事情，却仍然在全国国民党统治区层出不穷，南京惨案达到了这一时期公开残杀人民的顶点”。

在和谈问题上，何应钦与李宗仁是略有区别的。李宗仁对和谈的“诚意”似乎比何应钦要多一些。但他把心思和努力集中到如何“划江而治”和寻求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援助上，以便真正取蒋而代之。诚如张治中所言：“实在说，李的主和虽然目的在倒蒋，要是不问动机如何，他到底是想和的；可惜溺于一派一系的私利和个人的权位，无定见，无担当，到了重要关头，不能作出勇敢果断的行动^①。”而何应钦的“诚意”并不止于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是要想在“划江而治”的基础上，恢复

^①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社1980年版，第138页。

昔日国民党对全国的一统天下。

蒋介石虽在溪口，貌似野鹤闲云，但却有7部电台与外间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越过李宗仁、何应钦任意撤调封疆大吏；参谋总长顾祝同要调一兵一卒，都得向溪口请示。对蒋介石这种垂帘听政的太后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往往“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但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却不敢在行动上有所丝毫拂逆蒋意。一旦他冷静之后，而李宗仁还在大骂蒋介石，何应钦反来劝说李宗仁，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对何应钦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矛盾言行，李宗仁深感诧异。但何应钦私下据实告诉李宗仁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①！”说得李宗仁也不寒而栗。因为有人也曾经警告过他，就是你这代总统身边的侍卫，也全是蒋先生的人；只要蒋先生需要，随时可置你于死地。何应钦、李宗仁认为，要避免蒋介石在背后掣肘，唯一的办法是动员他出国。他们曾经请张治中等人委婉相劝，晓以利弊，都是白费口舌。因此只能听之任之，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国民政府原本就没有诚意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而何应钦充当了国民政府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那股特别顽固的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言人。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何应钦又一次为了蒋介石集团和个人的私利，甘受举国口诛笔伐的历史罪责。

4月20日，已经是国民政府表明态度的最后期限了。以李宗仁、何应钦为首的“和谈最高指导委员会”最后集会通过答复中共中央的电文，并由力主拒绝的何应钦向立法院“分析”中共代表团所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报告答复中共电文之内容。何应钦认为，“此项和平协定方案，充满了征服与接收的姿态，毫无对等谈判意味”。他向立法院所作的“分析”，可概括为六点：“第一，这个共方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根本不是一个和平协定，而是一个‘军事管理方案’”；“第二，就精神上说，根本不是和平的精神，更不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精神。如果说是降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58～963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印行。

书，比我们当年向日本提出的受降文件苛刻得多”；第三，对国民政府理所当然要承担的破坏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发动全面内战的责任，何应钦认为，“就政府的负担说，实在也担当不下来”；第四，对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军事独占是对付征服异族的方式、“报复的方式”，因而“不能接受”；第五，“关于军队的改编，当然十分严重……共军不仅一点儿也不改编，同时政府所属陆、海、空、宪警、地方武力，以及一切军事机构、学校、工厂、后勤单位，均一律改编为‘共军’”；“第六，所谓由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政府也是毫无地位……政府在未来政治上，可以说丝毫没有地位。”^①

何应钦与李宗仁两人联名致国民政府代表团并转中共代表团的电文中，对《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全盘否定。该电文说：“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势，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为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企图再度延缓解放军的渡江战役。

(二)

1949年4月20日午夜至21日，早已把立足点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过长江天堑的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之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地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同一天，何应钦、李宗仁召集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慨叹何为？据李宗仁说：“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

4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顾祝同等一帮高级将领分乘3架飞机前往杭州，蒋介石早已焦急地在笕桥航校等待。当李宗仁向蒋表示，和谈既已告失败，请蒋总统复职。蒋当即表示：此次会议不涉人事变动，只为求内部团结，共同反共。会上决定在国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10～1013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台北印行。当这份电报送达中共代表团手中时，和平谈判即宣告彻底破裂。

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非常委员会”，凡政府重大决策，先由“非常委员会”通过，再由政府执行。于是，蒋介石公开抛弃“引退”外衣，直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凌驾于政府之上。他要亲自指挥与共产党的“最后一战”。什么代总统、行政院长，名正言顺都得听他指挥了。在这次会上，还形成了四项决定：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四、采取紧急有效部署，总统府和行政院必须立即迁往广州。以加强国民党内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但凡涉及代总统及政府方面的具体权力方面事情，只要李宗仁一启齿，蒋介石都顺着他的意思，满口应承，完全支持，并支持到底。何应钦、李宗仁原已准备好的一肚子牢骚、计划、建议都只能吞回肚里。李宗仁到底拉不下情面，何应钦却因蒋又再次表示对他的重用，名义上有了统一指挥三军之权，仿佛西方的战时总统一般，哪能再有异词？

当夜，何应钦返回南京，命新闻局发表公报，把和谈破裂的责任全推给共产党，安排各部尽速完成向广州撤退事宜。深夜，四郊炮声隆隆，枪声密集。何应钦乘车返回斗鸡闸4号，叫司机在南京的主要街道绕行一遍，以示告别。往昔的夫子庙、花牌楼、新街口，目迷五色的繁华景象已无影无踪，除了呼啸而过的军用车辆和巡逻士兵之外，行人寥寥无几。从鼓楼到挹江门的新区，过去车水马龙，那些鳞次栉比的洋楼别墅，早已十室八空，偶尔有几洞窗口的窗帘里隐隐透出昏暗的灯光……

23日上午8时，在越来越近的枪炮轰鸣声中，何应钦匆匆登上飞机，前往上海。飞机从南京上空飞过，尽管长江如练，城阙依旧，但何应钦两眼茫然，眼空无物，从内心发出“别时容易见时难”的万千感慨。

羊城旧侣拆墙 败将尽忠赴台

(一)

1949年4月23日，就在何应钦的座机离去后8小时，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黄埔路国民政府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被降了下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欢呼声中升起来了。盘踞在南京整整22年的

蒋家王朝宣告灭亡。

在这苍黄翻覆的历史性时刻，何应钦、蒋介石、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陈大庆等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集中现有兵力保卫上海。在杭州，蒋介石宣布改组“国防部”，不仅让何应钦统一指挥三军，而且将过去奉“总统”之命执行军令的参谋总长归属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似乎何应钦有职也有权了。但“蒋总裁”正准备由幕后走到前台，汤恩伯也没有把何应钦放在眼中，对淞沪防务依然秉承蒋介石之意，我行我素。因此，何应钦实际上对军事无从插手，权充当所谓“政府发言人”。他这时发表了一份书面谈话：

……共产党此次乘政府对争取和平，要求停战作最后呼吁之际，发动总攻，大举渡江南犯，致狄港、江阴、扬中等地相继弃守，首都陷入钳形攻势之中。我驻守首都大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高度之战斗力量。我统帅部估计军事形势，当前尚非适宜决战阶段，不能不自动从首都作战略之撤退。且政府原早迁广州，部署停当，政府各机关驻京办事处自宜一律结束，重回我革命策源地，为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自由，继续奋斗^①……

何应钦在以他名义发表的这篇对蒋家王朝的祭文中，居然还以“爱国者”自居，称他们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挣扎“终必胜利”，就连蒋家王朝的群臣也不会相信此番诺言了。

上海有蒋介石坐镇，45万坚守孤岛的国民党军又是汤恩伯的禁脔。何应钦自感多余，于23日南下广州，去主持尚属于他的“行政院”的第56次会议。

李宗仁意识到与蒋介石公开摊牌，要他不再干预政治、军事、财政和人事，使自己“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决难做到”，就是蒋真肯放手，李也“毫无把握”。他离开南京后径飞桂林。在桂林，他陷于是做“降将军”，还是做“断头将军”的两难抉择之中，不愿到广州视事。

历史真会嘲弄人。那些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或给历史抹黑的形形色色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1～1022页。

的人物，便是它嘲弄的对象。何应钦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飞黄腾达，始于在黄埔军校任总教官，后来追随蒋介石反共，由广州到南京，登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军政生涯的巅峰。然而，22年之后，他却由南京又回到广州。去时辉煌，回时凄惶。这一来一往之间，何应钦由一名参加国民革命的“福将”，成了背叛国民革命的反共反人民的败将。

他一飞回广州，下榻之所尚未安顿，便紧急召开了“行政院”第56次会议。为了给先后撤至广州的阁员们鼓劲充气，何应钦重复着他在离开上海时对报界发表的书面谈话，把国共和谈破裂的责任转嫁到共产党身上，并声称南京的失守，纯属主动的战略撤退。他说：“共产党此次趁政府对争取和平，要求停战作最后呼吁之际，发动总攻，大举渡江南犯……首都陷于钳形攻势之中。我驻守首都大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高度之战斗力量。我统帅部估计军事形势，当前尚非适宜之决战阶段，不能不自动从首都作战略之撤退。且政府原早迁广州，部署停当，政府各机关驻京办事处自应一律结束，重回我革命源地……继续奋斗。”他还声称，这奋斗定会如22年前的东征、北伐一样，取得胜利^①。

何应钦主持的这次“行政院”会议的收获，是通过了两项实属多余的决议：一、撤销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其实，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等该代表团的成员，均已弃暗投明，留在北平，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共同建设新中国。之所以明令撤销，是何应钦借以表示，今后上述诸人的一切活动，均与他的政府无关了。二、尚在国民党军所控制的区域，一律停止对解放区的邮电汇兑。这道命令，似乎是给何应钦的五弟何纵炎下达的。当时何纵炎在广州任国民政府邮政总局副局长兼储金汇业局局长，由于邮政总局局长霍锡祥辞职未获批准，称病在家，何纵炎事实上行使了局长的权力，冻结向解放区的邮电汇兑，除表明政府与中共势不两立之外，实际目的是尽量减少金钱流散，以解决政府财政的断炊之虞。

这两项决议虽无补于时艰，但毕竟还是退踞广州的“国民政府”仍以“正统”自居的政治表态，也是何应钦尚存权力的佐证。

何应钦独自在广州，虽撑起“政府”的门面，却几乎陷于当年南明永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0~1021页。

历皇帝朱由榔由广西流落到贵州安龙时，“除扈从之外，无一兵一卒为王所有”的那种窘境。

身处覆巢之下，蒋介石依然故我。4月27日，他在上海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发表文告，幻想乞求“友邦”神来之手，让22年前的历史重演，并硬撑面皮，自欺欺人地说：“11年前南京撤守，政府西迁，乃是我们政府长期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撤守，政府南移，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在这篇文告中，蒋介石左一个“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右一个“所望我全国军民，一致接受李代总统的领导，全体将士，绝对服从何部长的指挥……达到成功的境域”^①。这种意在言外的表态，何应钦也明白，是蒋介石要正式出山前的序曲。



何应钦之五弟何纵炎（曾任国民政府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

（二）

南京解放以后，本已激化了的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李宗仁闲居桂林，与拥兵华中的白崇禧谋划如何保存桂系精锐，另谋出路。蒋介石却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着汤恩伯、顾祝同、胡宗南等嫡系部队，妄想将政府南移，固守西南、西北、华中，绝路中寻一转机。他虽然号召国民党军官兵和政府职员，“一致接受李代总统领导”，“绝对服从何部长的指挥”，但实际上他对内心想与共产党谋和的李宗仁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何应钦这位心腹干将反共的能耐和对他的忠诚已大为怀疑。但工于权术、心计的蒋介石，一方面仍要顾及“法理”，既不能骤然罢黜代总统李宗仁，还想利用桂系的数十万军队为他做最后的一拼；另一方面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2页。

面对“赤焰滔天，挽救乏术，人心迷惘，莫可穷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的乱局^①，何应钦这位“武甘草”似能起一些调和功能。犹如甘草不能单独治疗顽症痼疾一样，无一兵一卒可资调遣、无一官一员可供驱使的何应钦，纵然费尽移山心力，也只能徒张空拳替蒋介石呐喊。

擅长夤缘时会，随机应变，常常脚踏两只船而能左右逢源的阎锡山，在国民党江河日下、四分五裂之时，毅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充当调和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三巨头之间矛盾的说客，企图拉拢国民党各派系，支持残局。他两次飞往上海，向躲在太康兵舰上随时可以逃跑的蒋介石请示机宜，又两次飞到桂林向李宗仁劝驾，希望总裁、代总统能负起统驭、督导之责，帮助何应钦，挽救国民党山崩地裂般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危机。

早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何应钦替蒋操戈，纵横捭阖，瓦解了冯阎同盟，分而击之，使蒋终获胜利。他对山西土皇帝的文韬武略并不欣赏。但处此燕巢危幕、命在旦夕的绝境中，能有阎锡山这样的人在充当“激流中的勇夫”，自然倾心相与，委以重任。何应钦希望阎锡山设法劝说李宗仁回广州，以便凭借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对付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从经济入手，延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崩溃。

何应钦深知李宗仁为人宽厚、顾全大局、好合作，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声望，如能请其坐镇广州，指挥白崇禧手中的几十万精锐，号召云、贵、川、康，这小半壁河山尚可撑持些时日。况且，何应钦之所以临危组阁，跳下了火坑，导源于李宗仁的推荐。于是，何应钦函电如飞雪般发给李宗仁，希望他能这时出面，一起共度时艰。但李宗仁却不置一词。5月2日，何应钦只好央求阎锡山、居正、李文范偕同桂系实权在握的白崇禧亲赴桂林，并带去何应钦给李宗仁的一封亲笔密函，迎劝李到广州视事。李宗仁阅罢何应钦的情切意深且旨趣与己相投的信后，向阎锡山说，只要满足了他的条件，他立即恢复视事。阎表示他尽力周旋。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出六点要求：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

^①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133页，转引自《阎锡山评传》第47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